

张白山 著

危樓散墨



學苑出版社

老
樹
古
木

老樹古木

学苑丛谈

危楼散墨

张白山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楼散墨/张白山著 . -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9

(学苑丛谈/王学泰主编)

ISBN 7-80060-640-6

I . 危… II . 张…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850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永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8.25 印张 156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16.00 元

《学苑丛谈》序

王学泰

这套随笔丛书是用出版社的名字命名的，这种流行于海外出版社的编辑方式，在大陆还很少有出版社运用。学苑出版社的这次尝试，说不定还是大陆出版界首创呢^①！我想不是别的出版社没有想到这一招儿，而是大多数出版社的名字限制了它们不能这样做。过去大多数出版社都是用所在省、直辖市的名字^②，或是主管机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建筑、财经之类，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命名的。用这样的名字命名文艺、人文、社科之类的书系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按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名字的国家，孔子就说过“名不正，言不顺”。自古以来为了起个好听的名字许多人是费尽心

① 因为没有调查，不好说死。

② “文革”中每个省大体上也就一个出版社，称“某某人民出版社”。多一点的，至多加上个分类的修饰，称“某某美术出版社”、“某某教育出版社”、“某某科技出版社”而已。

思的。有权势地位的，或有经济力量的自不必说，就是我家乡没有文化的贫苦百姓也有对好名字的追求。听父亲说过，六七十年前，每家生了男孩子都要郑重地为他命名。没有文化的穷人家也要花上一块大洋请乡村的教师^① 为他起个非常雅气的名字和同样典雅的表德^②。如希望长寿的，名修龄、字彭年；希图富贵的，名廷璧，字蕴辉等等。这些有了美名的穷人们，可能一辈子只用两次，一次是写在家谱上，一次是死后写在神主牌位上，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猪娃儿”、“狗蛋儿”——人们仍用他们的小名称呼他们，到老了，也是“猪娃儿伯”、“狗蛋儿爷”。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并不因为没有用而改变他们对于名字的重视。这不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的追求。

近几十年来，民间这种对“文”的追求的传统被忽视了，事事皆归于“朴素”，人人以粗鄙为美，以无文为荣。不仅老百姓不讲“文”了，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也不追逐文采了。记得1958年“反右”之后又把王实味、丁玲、萧军四十年代在延安写的杂文如《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发表出来“再批判”。这些被称为“大毒草”的文章登在改版的《文艺报》上，并由该报编辑部写了一个“按语”以表达编辑部的态度。当这个“按语”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在上面用粗重的红铅笔批了四个大字

① 在那时，农村教师几乎是当地所有有关文化事宜的顾问。

② 也就是通常说的“字”。

“文人无文”^①，批评“按语”写得没有文采，他另代写了一篇“有文”的。毛批评是对的，“无文”、粗俗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何必单单批评文人呢！一人有文，万人无文，“无文”的最坏结果，不过是极偶然地被毛批评一次；而追求文采，它所可能招致的最轻批评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严重一点，就会被人们发现追求文采背后还有某种“反动的政治企图”，可知文化界的“无文”，并非文人都是白吃干饭的、根本不懂“文”，而是有意地在躲避“文”。因此，以传播文化为职责的出版社没有给自己起个有点文采的名字也是不奇怪的，谁愿意为个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名字去招惹是非呢？

二十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宽松，重新唤起人们文化意识和对文采的追求，甚至在某些领域这些追求都显得有点过份和变态。出版社的增多和命名上的讲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现在出版社增加到五百六十多家，其名字也不局限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方面，文化单位开始有“文”了。学苑出版社就是在呼唤文化的高潮中涌现的一个新型的出版社，它为自己起了一个富于文采和与本社服务对象相称的名字。苏轼有诗云：“笔砚耕学苑，戈矛战天骄。”它形象地表现了“学苑”是文人们的聚会和向学之所，用它来命名我们这套随笔和杂谈丛书是名实相副和十分恰切的。我们欢迎更多的从事学术研究和一切对于文化有兴趣的人们进入“学苑”，分享耕耘与收获的愉快。

① 我看过原件的影印件。

随着学苑出版社的成长与发展，希望这套丛书也能连绵不断，继续编纂下去。我想书系也像攀登高峰的登山队一样，腰间要系一根绳索，以免在攀援中迷失。出版社也是如此，在书籍的瀚海中，把题目或体裁类似的作品串作一系，不是分外醒目而令人关注吗？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为这套书题写了书名。

1999年7月

目 录

纪念艾芜

——兼谈《诗经》所收诗歌的时代问题 (1)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司马迁诞生 2100 年纪念 (8)

从《史记》谈到《鸿门宴》 (15)

金圣叹谈杜诗 (21)

王安石晚期的诗歌创作 (31)

读《夷坚志》札记 (54)

寒夜话宋江 (63)

关于花石纲 (72)

谈晚宋爱国诗人 (78)

文天祥临刑诗的真伪问题 (99)

关于七言绝句

——病榻琐谈	(103)
蜜蜂的刺	(114)
鬼与文学	(119)
谈英雄崇拜	(125)
谈传记文学	(130)
读《何典》	(134)
从《三国演义》谈到谋士的嘴脸	(138)
略谈创作的独创性	(142)
谈文艺书的封面画	(145)
劳生哀歌	
——谈兰姆的随笔	(148)

关于林纾.....	(153)
漫谈王国维.....	(158)
许寿裳与鲁迅.....	(162)
向闻一多先生学习.....	(170)
郁达夫先生二三事.....	(175)
读《孔乙己》.....	(180)
谈《荷塘月色》.....	(184)
谈茅盾的《蚀》.....	(188)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194)
关于《新文学教程》.....	(200)
沉钟社琐记.....	(205)
谈秧歌.....	(208)

扫墓的风俗.....	(213)
《苦涩的梦》题记.....	(219)
的卢马.....	(222)
谈忍.....	(227)
说蟹.....	(230)
记端午.....	(233)
写于深夜里.....	(240)
林语堂不知杜鹃.....	(240)
沉静中的回味.....	(242)
董其昌父子.....	(243)
文随年进.....	(244)
《简·爱》的作者	(245)

纪德与诺贝尔奖金.....	(246)
博学无闻.....	(247)
编后记.....	(249)

纪念艾芜

——兼谈《诗经》所收诗歌的时代问题

艾芜去世三个多月，悲痛之余，我很想写一篇文字，以寄哀思。不巧我又病倒，没能做到。眼下天暖，病情略有好转，我这才动笔来写。

艾芜与我相交五十多年，其间屡遭时变，细节这里不谈了。只说从桂林、重庆、上海以至后来辗转到北京，我们才再度见面，这可真是很不寻常的事。艾芜为人朴素恬淡，见面无所不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真。论年龄他比我大七八岁，而他却以平辈相待。

皖南事变后，我到桂林才认识他。那时不少同志都住在东郊七星岩一带，我也住在那里。我们在他的木板屋里相见。那木板屋地小人多，他被挤在一张木桌边写作。到日军攻陷桂林前夕，我们两家一起逃难，历尽艰辛，经贵州到重庆。到那里后，我家住乡下；他家住市区观音岩下的一间泥屋里。那屋子湫隘而潮湿，他没有正当职业，仍以写作为生。记得其间他受党的委托给《大公报》编《半月文艺》副刊。他约我写过几篇文章。我每次进城去看他与蕾嘉大嫂，每去辄留饭。其后

我在《新民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他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他自己给写稿外，还代约不少同志撰稿。后来这两个副刊先后被迫停刊，我们就各自亡命去了。

革命胜利后，我们又在北京见面，其喜悦之情可以想见。他还是老样子：消瘦而硬朗；还是一领布衣，一个布提包。那时我居城北，地僻罕人迹。他每来，我必欣然酌以淡酒。其时许多同志都在一定岗位上担任要职，极为繁忙，平时难得见面，仅有艾芜与我这些人却可以相见谈天。他在东城赁屋而居，屋仅一楹，地偏而静。有一次，我看他，正值他大女儿患病，困难不少，但他仍然坚持写作。不久，他写工人的长篇小说就问世了，立即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他顽强拼搏的精神，真是令人佩服。

60年代中，他决心移家成都，他说要写他熟悉的西南农村与农民。他回去后，不顾年高体弱，不避艰险，仍从四川去云南等地体验生活。不久，他的《南行续记》又与读者见面了。

艾芜回成都后，我们照常通信。他先是住自己家，后来以骨折伤重，住进医院，来信已多由别人代笔。我这才知道他的病情不轻。其间，我小女儿出差成都，我叫她去探望。她回来，说老人家健谈，精神很好。不料过了两三年，他竟终于不治而亡。他的去，我是很悲痛的。因为这不只是我个人失去一个良师益友，而且是我国文坛上失去一个优秀作家。我怀念着他，便来清理他的来信，发现其中一封是专谈《诗经》的。这信写于1978年，距今14个年头。我依稀记得翌年夏天，他来北京，我们在厂桥一家招待所里又见面了，而且就他信中提出

的问题交换过意见。但事隔多年，当时究竟怎么谈的，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兹将他这封信抄在这里，并对他所提出的有关《诗经》的问题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白山同志：

接到来信，知道你身体好，还不断地进行研究工作，使我不仅高兴而且得到鼓舞。真该像你那样老当益壮。

前几年无法创作的时候，就研究《诗经》，有些研究《诗经》的学者认为《风》诗出现于《雅》、《颂》之后。我则认为《风》诗是在《雅》、《颂》之前。可能有的还是殷代流传下来的。一是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殷代的；二是用的字，有些简直成为后来《书经》、《易经》所不曾用过。另外，《诗经》和《论语》中，发现孔子是大力拥护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非常反对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的婚姻风俗。因此，有人说，孔子主张恢复奴隶制度，对此我很有怀疑。《诗经》里有这样的诗：“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我以为这样的诗是描写奴隶制社会的婚姻风俗的，作为歌唱，显然是赞美这种风俗的。孔子在《论语》中却加以反对，如《论语》有一段话：“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这简直把“践迹”、“入人之室”看成坏分子了。“践迹”即“履即”。

因为你在研究古代文学，一定研究过《诗经》，忍不住

向你谈，希望指教。此致敬礼！

问候你的爱人和孩子。

薈嘉附笔问候。

艾芜 一九七八年四月

二十一日于成都

艾芜在信中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一是《诗经》所收《国风》，他认为产生于《雅》、《颂》之前，不是之后。“可能还是殷代流传下来的”；二是“有人说，孔子主张恢复奴隶制度，对此我很有些怀疑”，并举《齐风》中的诗句为例。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没有认真做过研究，这里只能谈一点初步看法。

《诗经》是我国最早一部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总集。一般的说法，“它共收入西周初年（公元前 11 世纪）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 6 世纪）的诗歌 305 篇”。《诗经》中的《国风》所收为当时流传于我国中原 15 个地方的土风民谣；《大雅》、《小雅》所收是宫廷配乐演唱的；《颂》则为宗庙祭祀伴奏的歌曲。不管怎么说，这部诗集都是经过漫长岁月流传下来的，且又经过多少人的窜改、增删、润饰。还有人说，《颂》、《雅》中某些篇章是经过孔子的删改的。但也有人说，孔子那时年仅 8 岁，他不可能改诗。这是扯不清的问题，姑且丢开不谈。

汉代《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我们现在看到仅有毛氏一家传本，且又是郑玄作笺的本子。《诗经》的通行本是我们小时在私塾念的朱熹《诗集传》。据刘克庄《刘氏诗说》一书中